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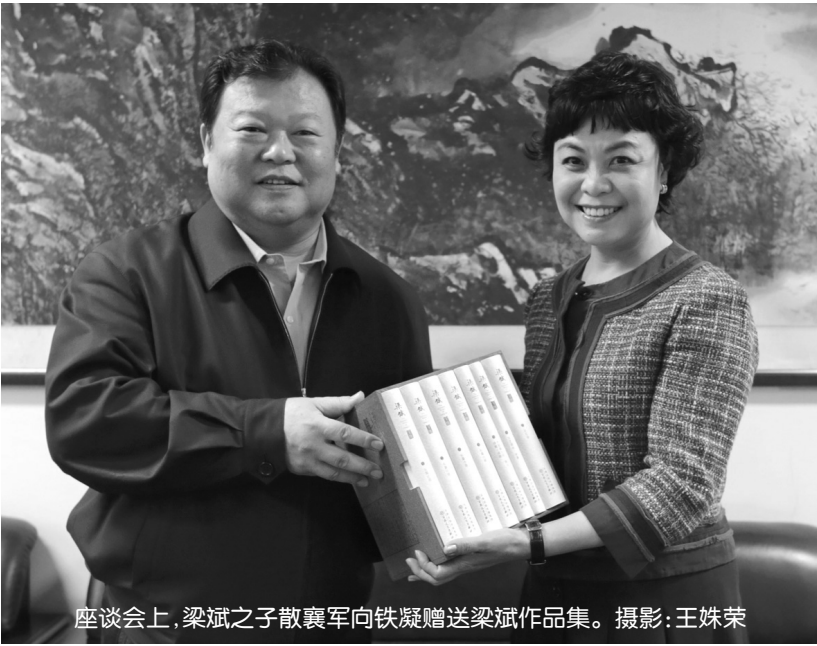
传递民族心灵深处最强音

□铁 凝

一句话，我以为用它来形容这部巨著于1957年问世后带给当时文坛和广大读者的震动，也是非常恰切的。《红旗谱》展现了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被茅盾先生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卡尔维诺说过：“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是一本从来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红旗谱》的传播史证明了它正是这样一部经得起一读再读的经典之作。它像璀璨的晶体，每个切面都折射出不同的光芒。

《红旗谱》带给我的思考与感悟同样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它让我看到了文学的“经典化”和“大众化”并不一定非此即彼，它们可以并行不悖乃至水乳交融。

而经典文学作品和眼花缭乱的媒介也不一定会相互疏离和遮蔽，相反它们可以共生共荣，相互扩展和提升。当然，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这部作品中屹立着的我们民族的魂魄、民族的风采。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如何透彻而准确地把握民族精神，对每一位作家来说都是极大的考验。我相信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和作家强大的人格相互映照。我看到梁斌先生就如一棵大树，站立在他的作品中，站立在大地上，他的根系接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也汲取着异域文明的营养；他的枝叶沐浴着时代风雨；他的果实酝酿着对未来的梦想和信念。通过艰苦卓绝的艺术锤炼，梁斌先生传递出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最强音。



座谈会上，梁斌之子散襄军向铁凝赠送梁斌作品集。摄影：王姝荣

大地之子 烛照当今

□陈 洪

我们今天纪念梁斌，意义超出了通常对一位作家的缅怀和纪念。我个人感觉至少具有这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价值的意义。我曾于近日参观了天津的梁斌生平作品展览，展览的主题是：大地之子。文学艺术的根在哪里？这在40年前好像不言而喻，但现在却是一个问题。所以，梁斌大地之子的品格，价值观的意义特别突显。第二，历史的意义。我们读《红旗谱》三部曲，那些八九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情，和我们今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为什么走到了今天？今天的合理性、合法性根源在哪里？读一读他的作品，对于解决今天的问题是有所启发的。第三，文化的意义。《红旗谱》透露出来的阳刚气质，有别于其他当时同类作品，而这种气质对于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对于中华民族有着非常正面的文化建设的意义。第四，审美的意义。怎么能写出自己独特的的气质，把自己生命的体验表现在作品里，怎么把民族文学的因子巧妙自然地融合进去，梁斌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榜样。他的胸襟如此广大，他内在的气韵如此雄壮，这种精神气质最可宝贵。

宝贵的精神遗产

□赵 玫

梁斌作为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在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时，也成为现当代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始终不忘叙写民族历史、讴歌时代变迁，将自己的写作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他的《红旗谱》等系列产品，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册中的经典之作。半个多世纪以来，拥有着一代又一代虔诚的文学读者。他的作品还被改编成影视剧、舞台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些，无不说明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特别是以朱老忠为代表的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增添了现当代文学艺术画廊的奇光异彩。梁斌系列产品问世以来，社会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它所体现的深刻社会内涵，仍然与我们今天的现实息息相关。这种一脉相承的思想力量，对投身改革开放的人们，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当年，青年梁斌弃笔从戎，投身到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中去，是因为他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解放后，他放弃高官厚禄，淡泊名利，从事文学创作，同样是因为他有着崇高的人生信仰。在当前，弘扬梁斌精神有着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是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杰出的人民作家

□郑法清

梁斌是当代杰出的人民作家，他一生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文学巨匠和造诣精深、风格独具的书法家、国画家。

梁斌的《红旗谱》是一部中国农民觉醒与奋斗的宽广壮丽的史诗；它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标志着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回归本土、回归民族文化的重大成就；它慷慨悲歌、燕赵风骨式的悲壮美创造了审美新境界，独步文坛，鲜有来者；它所塑造的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文学典型，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而且振聋发聩，至今无可比肩。

梁斌的贡献，在于他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事》等长篇小说，几乎全景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艺术再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伟大力量。他以笔下人物的命运，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艰难历程，揭示了中国农民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得到翻身解放，共产党也只有动员人民群众投入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梦想这一真理。

梁斌的贡献，还在于他的文学精神至今烛照文坛。他是人民的儿子，他的创作是为人民的，他始终将自己的笔根植于群众的土壤之中。为了创作《红旗谱》，他舍弃个人利益，不顾个人安危，潜入敌后采访抗日军民；为了“补上”土改那段生活体验，他放弃解放区安全的社会环境，毅然随军南下，率领工作组开辟新区；为了集中精力写作，他四次辞官不做，无欲无求，

梁斌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发言摘要

自甘寂寞，只事耕耘，不计收获，精益求精，死而后已。他将自己7部书的手稿全部无偿捐献给了现代文学馆。他说：“我的文学是为人民的，我的手稿也是属于人民的。”

河北作家要向梁斌学习

□关仁山

梁斌是在河北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杰出作家，也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忠诚战士，少年时就曾参加过爱国学潮，并亲历了家乡农民革命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三上太行山，五下白洋淀，七闯封锁线，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和游击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他始终与人民、与祖国同呼吸共患难，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的精神风范。

梁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的一生创作丰厚。《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经典作品，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红旗谱》开创了革命文学创作的新高度，被誉为里程碑式的作品。那种浸润着燕赵文化气息的白描语言、恢弘结构，以及朱老忠、严志和等典型形象，永留史册。他对冀中农民的感情，对我和河北作家影响深远，让我们在创作中更多地关注农民的命运。河北作家应当学习梁斌的人格魅力、高尚思想品质和艺术造诣，学习他对文学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弘扬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扎实生活，诚实写作，推动河北文学事业的发展。

感念梁斌的馈赠

□程良胜

1948年，梁斌主动要求南下，补充生活，1949年受党派遣到湖北工作。繁忙的政务工作使他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把工作作为深入生活的好机会，为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素材。梁斌到任不久，时任襄阳县委书记的张廷发委派他带队，到襄阳县欧店区刘家庙村、水洼村发动农民群众清匪反霸，实行土地改革，并把该地区作为襄阳县土改工作的试点来抓。梁斌在执行党委决议、出色完成工作的同时，以一个作家的敏锐眼光观察身边的人和事，并把这些素材记在随身所带的一个小本上。工作队队长刘鼎、副队长李焕章、地委秘书大老韩、警卫员刘洪发以及刘爷庙村村干部刘和清、贫农刘黑子、老尼姑、小学校长刘进福、教员刘素华、肉头地主、联保主任等各阶层人士的喜怒哀乐、声音笑容都可在梁斌《翻身记事》中找到影子。

湖北是梁斌的第二故乡，因为《红旗谱》是在这里孕育成熟的，《翻身记事》是在这里获取了大量生活素材，这对于他的文学创作是至关重要的。荆楚大地滋养了梁斌的创作，梁斌也以优秀作品为荆楚大地树立了典范。梁斌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仍然影响着湖北的文学，我们感念梁斌的馈赠。

历史的审美化见证

□雷 达

我非常赞同茅盾先生的一句话，就是：《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别的同类型作品他没有这么说过。这句话意味深长。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画丰满度，在地域文化性格和民族气派上，《红旗谱》的文学性所达到的水准堪称杰出，这是毫无疑问的。

研究《红旗谱》需要深刻的辨析。现在我们不提阶级斗争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阶级斗争不曾存在过。这是我特别想讲的一个问题。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经过多么深重的苦难，处于当时情境，必须起而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红旗谱》就是写当时那种不可避免的抗争。至少在这部书中，写出了这种不可避免性和强烈的真实性，写出了农民从自发的抗争到自觉的革命的过程。

与此相关，《红旗谱》写中国农民的农民性也很深刻。我们都知道，乡土写作有几大叙事模式，鲁迅开创的启蒙叙述模式，再有就是阶级叙事、田园叙事，我还要加上近30年来的文化叙事。《红旗谱》不同，他不是写阿Q的自欺，而是写朱老忠的倔强和不低头，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另一个典型，这是很了不起的。朱老忠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农民形象，通过他和严志和（后者辛酸地卖地）的对比，反映出他对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解读非常深刻。现在，高校里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其实梁斌早就写到了，而且写得很深。他不是从理论指导下写的，是从实际生活的痛切感悟中写的。《红旗谱》比

现在很多作品写土地问题都要深刻，这是它了不得的地方。

时代的眼睛

□白 烨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在当代作家中能达到罗曼·罗兰这一要求堪称伟大艺术家的并不多，但梁斌无疑是为数不多的伟大艺术家之一，他的《红旗谱》就有时代眼睛的功用，通过这眼睛我们可以看见红旗漫卷的时代，看见那个时代的事态风情、特有的人性人情。在革命与农民的层面上写出了中国革命本质上是农村革命的特殊性，这使《红旗谱》不仅奠定了它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经典性地位，也使它以丰富内涵和杰出艺术风范更具有历史穿透力与文学的生命。

为什么《红旗谱》能够超越时代意识框范与文化限定，铸就文学经典？我想谈四个部分的理解：一是经历与经验。经历与经验在梁斌创作上非常重要，他写的所有事情全是他经历过的，很多人物其实都是他的师长或战友，这些人物和他们的事迹以打腹稿的形式装在他心里，活在他心里，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在写他们也是在写我们。第二是超越了革命斗争所有战略的层次，立足于革命生活现实，并没有写成一部革命生活写实，而真正做到了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第三是传承与借鉴。我们通常以为梁斌是农民作家，其实他早期就是文学青年，他读了大量的作品，那个时候像他能读那么多作品的入非常少。阅读给了他另外一种文化参照，给了他很多艺术上的营养，使自己的本土性更突出。第四是淡泊与专一。梁斌的革命经历非常丰富，根据他的革命经历跟资本雄厚那种人脉来看，为官比为民还会更好，所以他当官非常自然，而且他当官的机遇也很多，但他四次辞官，很坚定，就是一心思想要写《红旗谱》。这在那一代作家中非常了不起，对我们今天非常有启发意义。从这个意思上讲《红旗谱》不光是作品，包括创作的姿态对我们都非常有光芒，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对这个作家表示尊敬，表示感谢。

梁斌的文学史地位

□孟繁华

《红旗谱》塑造了朱、严两家三代农民与革命历史相关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农民形象。朱老巩、朱老忠、江涛、运涛三代农民处于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朱老巩在阶级压迫下自发地走上反抗道路；朱老忠从个人复仇中逐渐实现了自觉革命和为阶级而斗争的转换；江涛、运涛们在共产党的引导下，一开始就是觉醒的农民，他们是作为革命的主流力量而出现的。《红旗谱》的不同反响之处，是将一个中国农民的现代性的本质的生长过程包裹在一个传统的子报父仇的通俗小说故事中，以“成长小说”这种现代艺术形式描述了这一抽象本质的生产过程。

《红旗谱》以传统的艺术形式，叙述或包裹了现代小说崭新的因素，这是梁斌的一大发现。作者对自己的期许是创造出一部具有“民族气魄”的小说。在长期准备的基础上，他掌握了冀中平原的民众语言。这是《红旗谱》“人民性”的标志之一。但更重要的还是作者对同时代农民英雄人物性格的把握。在具体的表达中，特别是对农村生活的具体描摹中，那里所体现的民间气息、江湖色彩和传统小说的侠义性，往往超越了小说主题和作者的理性观念，而和日常生活无意识地建立了更广泛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在展现北方农村生活的丰富性上，比起它的“史诗性”追求更有值得肯定的文学意义。

农民命运书写的里程碑

□王之望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大规模反映农民起义的影响深远的文学经典，堪称中国文学农民命运书写的第一座里程碑。鲁迅先生以其小说《故乡》《祝福》《阿Q正传》等不朽经典作品，深刻地暴露了中国农村病人膏肓的社会现状，这是中国农民命运书写的又一座里程碑。《红旗谱》则是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梁斌在对农民命运这一历史命题进行思考和文学书写中，成功地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首先，《红旗谱》以史诗的笔法，令人折服地描绘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教育下，由自发反抗到自觉而不屈不挠地投身革命的壮阔历程。其次，着力展示革命农民的精神风采。梁斌笔下的革命农民在党的教育影响下，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先进思想理念，将中华民族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提升到时代的新高度。三是肝

胆相照的忠贞精神。对信念、友谊、讲忠诚，重义气，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又一传统美德。小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给这一传统精神和人文品格赋予了更高的意义。四是丰厚的人情味和人性精神。小说描写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因而合乎逻辑地大量表现情同骨肉的阶级兄弟之间的真挚感情，表现各阶层人民满腔爱国报国之情，同时也大量描写了渗透于家庭与家庭、亲人与亲人、乡邻与乡邻之间醇厚温馨的人伦情、恋人爱、邻里谊，表达了深刻博大的人性和人道内涵。最后，始终贯穿坚定、乐观的基调。与《水浒传》、鲁迅小说不少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以及作品中关于农民命运的挥之不去的低沉悲观情调截然不同，《红旗谱》对于农民革命的成功和未来命运始终充满坚定不移的信念。梁斌笔下的革命农民英雄群体是旧中国的埋葬者，又是新中国的奠基者，因此，茅盾将《红旗谱》界以农民命运书写“里程碑”的美誉，完全具备充分的事实和逻辑依据。

《红旗谱》：乡村世界的百科全书

□ 张志忠

《红旗谱》问世之始，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下，被誉为乡村革命的史诗。就此而言，《红旗谱》是当之无愧的。它从清朝末年的“朱老巩大闹千里堤”讲起，直到抗日战争烽烟初起，跨度近40年，对燕赵大地的历史风云，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革命斗争，予以了浓墨重彩的描绘。但是，仅仅将其限定在革命的视域中，我以为不足以充分估量《红旗谱》的独特价值。如果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产生的一批“红色经典”中，革命是其共同的主题词，那么，在展现生活的丰富宽广，展现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上，《红旗谱》可以说是独具一格的，它堪称是乡村世界的百科全书。它在展现中国现代乡村生活的错综复杂和鲜明生动上，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近百年间的乡土小说中罕有匹敌的。

检读文本，除了《播火记》对于农民暴动的大篇幅描写，《红旗谱》和《烽烟图》中，直接描写阶级斗争和抗日斗争的笔墨并不算多，贯穿于作品中的，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不是说，作家用日常生活情景的描述稀释了革命的主题，而是作家的心目中，革命只是乡村世界中的一个方面。土地、乡情和劳动、爱情，都是作品的重要支点。譬如说，对于劳动的赞颂，就是一以贯之的。再比如，对于历史走向的思考。冯贵堂的乡村改良，推行棉花、梨树的新式种植，提倡多打井和使用新式农具，还身体力行地向农民进行示范，结果呢，不但其父亲冯老兰不赞同，农民对新农具和新耕作方法也没有多少兴趣。这当然是历史的吊诡。而江涛和冯登龙面对民族危机的不同选择，国家主义在激进的青年一代中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成长的”历史和时代的象征

□闫立飞

朱老忠的文学史价值，不仅在于他已经走出传统农民英雄的历史局限，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是一个“在历史中成长”的具有丰富包蕴性的“未完成”性格形象。朱老忠不是草莽英雄，也没有朱老巩那样的火气，背负血海深仇的他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本色，一直抑制着自己的“火爆脾气”和“愤怒的心情”，用“出水才见两腿泥”来鼓舞士气和宽慰自己。这一安排恰恰体现了梁斌的良苦用心，“梁斌给朱老忠的定位，不是一位传统小说中常见的性格不变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处于动态的时间关系中的不断‘成长’的新的形象”，而“成长”的进入，不仅使《红旗谱》体现了一种与传统小说相异的“时空原则”和“知识谱系”，“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到一个艺术形式更为完备的‘当代文学’时期”，而且也使得朱老忠成为新旧时代的“媒介”，“对于旧中国农民来说，朱老忠是一个性格的‘总结’；而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的中国农民来说，它又展示了一个新的起点。它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同盟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动力”。站在“旧”历史终点与“新”时代起点的交汇处，朱老忠的形象获得了历史与时代的烛照，成为“成长的”历史和时代的象征。

文学经典与中国经验

□王立新 曹霞

关于《红旗谱》的研究，我们合作写了一篇文章《〈红旗谱〉：文学经典与中国经验》。

《红旗谱》可以说达到了时代诗学的高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文学方向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核心是塑造新英雄人物。在《红旗谱》中，朱老巩朱老忠、江涛运涛、张嘉庆李霜泗，构成一组英雄群像，他们的转变和投身革命的过程标志着锁井镇这样的农村进入了现代历史。这部小说同时以“现实和浪漫”达到了对“两结合”的呼应。《红旗谱》也是民族形式的典范，梁斌向《红楼梦》等古典小说学习，通过大量的日常生活描写展现了农村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梁斌具备深厚的文学修养和语言造诣，小说不可遏止地流露出一种清新、雅致的“文人气”，由此接通了中国文化中的抒情传统，将“革命叙事”带入了抒情的境界。这部小说出半个多世纪了，到今天它还在被广泛地阅读和研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以生动的笔触和饱满的深情建构起了一个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稳态的“乡土中国”，通过讲述地方农民的“起义”和“暴动”故事，一步步展现出乡村秩序如何与“革命”实现了同构，最终完成了由“乡土中国”向“革命中国”的转换。

书写现代知识分子谱系

□何 平

《红旗谱》在讲述农民革命的悲壮历史的同时，书写着现代知识分子和乡土中国的复杂关系，并且从它自己的角度改写了现代文学传统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理解。

旧中国乡村是自足而封闭的，但就文化空间上讲，中国乡村又具有开放性，从《红旗谱》中我们看到乡村可以轻而易举地接纳像冯贵堂这样的落魄官员，而且只要找到合适的路径，各种权势意识形态也可以在乡村长驱直入，这就是贾湘农、江涛所引动的农民革命为什么具有滋生本土的土壤。然而，富有意味的是两代知识分子殊途同归的是他们能引动乡村的革新的都是物质利益层面的东西，江涛领导的反割头税如此，冯贵堂在乡村推行的农业商品化在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乡村也得到了遥远的回响。而像冯贵堂的拆大庙、办教育、村政民主化这些触及乡村文化和传统根基的东西却为乡村所排拒着。从这里，我们也许能窥见从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到上世纪40年代的革命启蒙的转换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的乡村理解和变革策略。

应该说，冯贵堂和江涛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分野从表面上看是阶级的鸿沟，其在隐含的却是深刻的文化理想的裂痕。仔细深究下去我们触及到的是现代和保守、激进和稳健的复杂文化隐脉。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漫长摸索中，江涛他们似乎已经找到进入乡村的路径。那么对冯贵堂他们的悖时、孤单的坚守和对理想的践行，假如撇开阶级偏见，我们是否也能给予他们以理解而同情呢？进而我们思考的是，《红旗谱》这样的“红色经典”是不是仅仅在阐释中国革命史时才能发生意义？《红旗谱》那些超出它所处时代政治规范的东西使得《红旗谱》在今天依然闪烁人文和审美的光芒。

根植中国文学传统

□周新民

梁斌自小就十分喜爱《水浒传》，多次阅读《水浒传》，在其创作《红旗谱》过程中，深受《水浒传》的影响。除了在人物形象塑造等技术环节的影响外，《水浒传》对《红旗谱》《播火记》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1950年代，《水浒传》的主题被阐释为农民起义，为梁斌创作《红旗谱》《播火记》叙述中国农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式以巨大的启发，为中国旧农民自觉地上反抗道路找到了传统思想依据；《水浒传》的侠义叙事为《红旗谱》《播火记》的革命叙事提供了母题，同时，从侠文化切入这些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显然是对燕赵大地中国农民觉醒者的历史状况的真实反映，从而把革命的时代主题和传统主题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水浒传》的武打叙事一方面为《红旗谱》《播火记》的暴力革命叙事找到了源泉，也为《红旗谱》《播火记》增添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审美情趣；《水浒传》由楔子开头的顺叙的结构方式，使梁斌一改传统的倒叙结构，直接启发了《红旗谱》《播火记》的线性结构，使其具备“成长小说”的艺术特性，保障了小说主题的顺利实现。《红旗谱》《播火记》固然是一部叙述中国农民革命的史诗巨著，但是，它不仅仅是对中国革命史真实的记载，还是对中国文学传统自觉地、全方位地继承的一部佳作，实现了现代革命叙事与传统小说叙事有机地融合。正因为《红旗谱》《播火记》根植中国文学传统，才具有穿越时空的思想穿透力与艺术魅力。